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

肖鸪飞, 朱 滨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对外直接投资也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 文章利用引力模型从经济因素、政治制度、文化环境以及地理因素等方面系统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的海外投资主体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投资时的战略目标明显不同, 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属于技术战略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 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属于资源寻求型。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区位选择; 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 F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 0098(2016) 04 - 0047 - 12

一、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资源和生产要素配置全球化, 资本和产品流动全球化以及科技扩张全球化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引入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也成为实现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手段。中国的“走出去”战略指的就是本国企业走出国门, 在本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进行投资。对外投资不但能使中国的产品与技术走出去, 也能在与海外企业的竞争与合作中提升自身的实力与竞争力, 使我国企业更快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OFDI) 萌芽, 少量企业开始走上国际化经营的道路, 但总体而言, 对外直接投资并未受到企业和政府的重视, 在接下来的近 30 年,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一直很小, 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占比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 2001 年,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并开始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经济发展战略, 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开始加快, 尤其是 2005 年至今,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OFDI 的规模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 2015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达 1180.2 亿美元, 成为全球第三的对外投资大国, 详见图 1。

跨国企业在作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后, 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进行正确的区位选择。区位选择的正确与否是一个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成功的关键性因素。所谓区位选择, 就是为了实现最大的经济利益, 跨国企业在考虑所有的因素后, 选择除本国外的一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本文就是在前人学者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 系统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

二、文献综述

由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史悠久, 国外学者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已较为完善和

收稿日期: 2016 - 04 - 18

基金项目: 长江学者与教育部创新团队计划“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与战略选择”(IRT1224)

作者简介: 肖鸪飞(1960 -), 男, 江西吉安人, 教授, 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 朱 滨(1990 -), 女, 湖南娄底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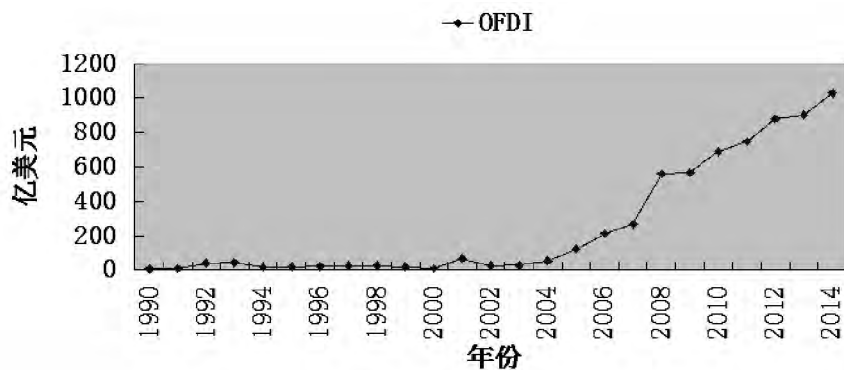


图1 我国1990-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趋势图

数据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与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公布的数据统计而成

成熟。有的学者从东道国的经济因素的角度来考量,例如, Filippaios、Papanastassion(2003)^[1]试图用东道国的国民收入水平、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对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来解释美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在泛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历程。Yeaple(2003)^[2]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美国主要是利用其比较优势来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东道国的市场因素对美国OFDI的区位选择有显著影响。Diffield & Taylor(2009)^[3]通过实证检验分析发现,劳动生产率、工资成本这两个经济因素会显著影响技术拥有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区位选择,而对技术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区位选择的影响不显著,从而对这两种投资主体进行了区分;有的学者从经济资源的角度来解释,例如, Soad, Halim & Noor(2011)^[4]在对马来西亚对外直接投资(OFDI)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发现,自然资源的可获得性、市场规模等因素会显著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较大的出口规模也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但效果不明显;有的学者也试图研究制度、文化环境等因素对投资主体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的大小。例如,虽然美国的跨国投资企业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和丰富的国际经营投资经验,但有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区位选择时仍会倾向于制度环境较好的东道国,制度因素虽然不是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的关键决定因素,且制度腐败的国家和地区所带来的潜在的较多的投资成本也是跨国企业尽量规避的。(Sanyal & Samanta 2008)^[5]。而Holtbrügge & Kreppel(2009)^[6]则认为制度因素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之一,只是对不同的国家,它的影响程度也不同,金砖四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属于市场和技术寻求型,制度因素虽然对这些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会产生影响,但效果不显著。同时,如印度和巴西等国家,相比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对区位选择的影响更大,而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来说,母国的政策制度的支持有效推动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向前发展。

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发展历程不长,国内已有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多是基于国外已有的关于投资主体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早期,由于数据的不可得性,学者们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分析和前景预测上。例如,陈燕(2005)^[7]研究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从萌芽到2004年区位选择的特点,认为我国的投资主体在区位选择上表现为“小”而“散”,中国在开拓国际市场时没有形成重点的地域,这种区域分布不利于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进一步发展。陈凡、王方(2004)^[8]的研究表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以拓展市场为主要动机,其规模的加速发展主要依赖于政府的政策支持及跨国企业明智且有远见的企业发展策略。郭建中(2002)^[9]发现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不均,北美、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量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规模的占比很高,而在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地区的投资相对较少,这样将不利于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长远发展。因此,他认为未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应重点转向于投资发展中国家。李汝、丁宪浩(1999)^[10]的研究表明,跨国企业的国家化经营能否取得成功主要取决于区位选择、产

业布局是否合理。刘海云(1998)^[11]认为规模经济是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其影响程度的大小将根据市场结构的不同而改变。方明媚(2008)^[12]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进行区位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包括企业投资的战略目标、投资主体的比较优势以及东道国的投资环境。

随着我国跨国企业统计数据越来越规范和可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利用数据来实证检验和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程慧芳、阮翔(2004)^[13]实证结果表明,两国的经济规模总和(投资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规模以及人均GNP都会正向显著的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项本武(2009)^[14]选取2000-2007年相关数据为样本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显著受到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影响,且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我国对其投资反而越少,即中国跨国企业并不是市场寻求型。双方贸易量的增加及汇率的稳定则会显著促进中国对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李猛、于津平(2011)^[15]的实证分析表明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和市场资源显著影响着投资主体进行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而良好的制度环境不但不会促进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反而会有抑制作用。许和连、李丽华(2011)^[16]的实证检验论证了文化距离与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呈反向相关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企业倾向于在与我国文化环境相近的国家和地区投资。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机制

已有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发现,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资源寻求型。自然资源的可获得性及其相应的价格质量、东道国的资源设备条件、政府对外资企业的限制及鼓励政策,如免除税收、加速折旧、土地补贴等,这些因素是70年代发达国家的投资主体对外直接投资时考虑的主要因素;(2)市场寻求型。指的是跨国企业更倾向于邻近地区的市场或最大成长中的市场和东道国存在有同类公司的竞争;(3)成本寻求型。部分跨国企业海外投资时主要考虑在东道国投资时的真实成本,如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成本以及是否存在关税壁垒等;(4)效率寻求型。产业聚集和专业化空间聚集(如科技工业园)的存在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5)战略资产寻求型。东道国不同的文化、制度与体制、知识资产的可获得性和可利用性也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时考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除了受到上述五种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其自身特殊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母国的政治因素、跨国企业本身的国际竞争力以及母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由于经验不足和技术条件的缺乏,发展中国家的海外投资主体的国际竞争力不能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相比,从而在投资战略和区位选择时的决策并不一定成熟。

基于变量的一般化、变量的可计量性以及数据的可得性三个原则,本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主要选取的解释变量包括:东道国的市场规模(GDP)、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双边贸易联系(Trade)、东道国的资源禀赋(ENG)、双边汇率水平(EX)、中国与东道国的地理距离(DIS)、东道国的制度质量(PS、RL、CC)以及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CD)。

(一) 东道国的市场规模

理论上,市场规模是OFDI的重要决定因素(Dunning)^{[17][18]}。Knickerbocker(1973)^[19]发现跨国投资主体更加偏向于在市场规模较大的东道国投资,这样一方面可以为公司的特定资产资本化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可以作为该行业的主导公司率先进入新市场。大量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分析表明,市场规模的大小会显著影响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区位选择决策。由于跨国投资主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不同,市场规模在其影响因素中位于不同的地位。对于中国而言,跨国投资企业不仅会考虑市场规模对其的影响,还受政府相关政策的影响以及相关地理文化的影响。综合考虑下,无法确定市场规模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是产生正向影响还是负向影响。

因此,可以假设:

H1: 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会显著影响中国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方向不确定。

(二) 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量

对外贸易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拓展海外市场最早的方式和手段。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的长期贸易以及贸易规模越大越有助于投资国对东道国市场了解程度的积累,这样也可以大大降低投资国 OFDI 的风险。由贸易带动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跨国企业海外投资时的重要表现形式。一般而言,企业从一个小公司发展为国际跨国公司的一半途径是:本地市场—国内市场—贸易市场—投资市场—全球市场。这里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联系主要指的是出口贸易联系。

因此,可以假设:

H2: 与东道国之间的出口量与中国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正向相关。

(三) 东道国的资源禀赋

中国虽然是一个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企业对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资源寻求型企业就将目光瞄准了海外资源丰富的东道国。从现实经验来看,中国的跨国企业收购东道国的资源型产业并不鲜见。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中国的 OFDI 在非洲和拉美地区明显增加,这可能与该地区丰富的资源有关。但是,现有研究对中国 OFDI 的资源寻求动机的探讨结果并不一致。所以,中国 OFDI 的资源寻求动机值得关注。

因此,可以假设:

H3: 中国的投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呈正相关关系。

(四) 汇率水平

从投资国企业的投资成本来看,汇率也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如一国的货币属于强势货币,该国货币可凭借其购买力和货币价值的优势,强势流向货币弱势的国家。Aliber(1970)^[20] 研究发现,汇率的低估或高估都有可能相对低资本成本的国家通过寻找一个比其国内更低的贴现率来资本化其资本,以在未来取得收益。这就意味着弱势货币的东道国会吸引强势货币的投资国对其进行投资。

因此,可以假设:

H4: 中国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会随着汇率水平的降低而增大。

(五) 中国与东道国的距离

Buchley & Casson(1976)^[21] 通过理论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更倾向于母国周边的邻近国家。地理距离的增加,交易成本、运输成本也会随之增加。此外,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距离的增加也可能会增加跨国企业集团内部人员的管理成本和管理风险。因此,地理距离的增加会加大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投资成本。

因此,可以假设:

H5: 中国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之间的距离负相关。

(六) 中国与东道国是否签订贸易协定或是否为同一区域贸易组织成员

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签订的贸易与投资协议,或中国与东道国同属于某一贸易组织,这都将有利于中国在东道国的投资。

因此,可以假设:

H6: 贸易协议或贸易组织同盟将促进中国 OFDI 的发展。

(七) 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

对于资源寻求型的跨国投资企业,劳动力成本也是他们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三种优势中的区位优势也包含东道国的生产成本优势,而生产成本除了资源成本外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也是跨国企业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重要考虑因素。

因此,可以假设:

H7: 中国跨国企业的 OFDI 与东道国相对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呈负相关关系。

(八) 东道国制度环境

Buckley&Casson(1976)^[21]认为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受到东道国恶劣制度环境的影响。但是该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还有待探讨,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开展 OFDI 的企业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除了利润最大化动机外,它们还有“非市场动机”,这可能促使它们愿意承担更多制度风险。其次,中国企业特有的机遇或激励。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制度环境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环境有相似性,中国的企业反而比发达国家的投资企业更能适应和面对这种制度环境。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中国国有企业投资更多遵循利润最大化和股东权益最大化原则,因而中国企业的制度风险规避意识在明显增强。

因此,可以假设:

H8: 东道国的制度质量越好,中国跨国企业对其的直接投资量越大。

(九) 中国与东道国的文化距离

随着经济学家们研究广度和深度的推进,文化环境因素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重视,文化因素也被纳入经济领域的研究范围。一般来说,文化差异大,也会增加投资企业的管理成本和销售成本,当地人才的引进和当地消费的偏好带来的投资成本都将增大。Geert Hofstede 提出了文化距离这一概念,他指出文化主要有四个维度:(1) 权力距离;(2) 不确定性规避;(3) 个人/集体主义;(4) 男性/女性特征。结合这四个文化维度,本文借鉴 Kogut & Singh(1991)^[22]的文化距离指数(CD)来衡量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CD_j = \sum_{i=1}^4 \{ (I_{ij} - I_{ic})^2 / V_i \} / 4$$

其中 CD_j = 中国与第 j 个国家的文化距离; I_{ij} = 第 j 个国家在第 i 个文化维度上的取值; I_{ic} = 投资国在第 i 个文化维度上的取值; V_i = 第 i 个文化维度的方差($i = 1, 2, 3, 4$)。

因此,可以假设:

H9: 中国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呈反向相关关系。

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检验

(一) 计量模型设定、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检验分析采用的是引力模型。从前人学者的研究来看,引力模型最初被学者用来分析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发现贸易和投资之间是互补关系,引力模型也开始被纳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领域。本文参照 Wei(1995) 和 Di Mauro(2000) 的研究,为检验所研究的变量,将引力模型适当变形,最终模型设定如下:

$$\ln(OFDI) = \beta_0 + \beta_1 \ln(DGDP) + \beta_2 \ln(GDP) + \beta_3 \ln(Trade) + \beta_4 ENG + \beta_5 \ln(EX) + \beta_6 \ln(DIS) + \sum_n \theta_n C_{ji}^n + \varepsilon_{ji}$$

其中, $OFDI$ 表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DGDP$ 表示中国的 GDP 水平, GDP 表示东道国的 GDP 水平, $Trade$ 表示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量, ENG 表示东道国的资源禀赋, EX 表示中国与东道国的汇率水平, DIS 表示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地理距离, β_0 表示常数项, ε_{ji} 为残差项, C_{ji} 为观察变量。根据理论假设,观察变量主要包括: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东道国制度环境和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2003-2013 年历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年鉴》、世界银行、www.indo.com 中的距离计算器和 Hofstede 的个人网站。

(二)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关于检验方法,本文先用 Hausman 检验来确定采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其结果拒绝了固定效应。因此,我们采用随机效应进行检验。关于估计方法,本文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

对全部样本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具体见表 1。从整体来看,检验结果和前文的假设基本一致。中国经济发展水平($\ln(\text{dgdp})$)的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我国不断提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的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发展。越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越能为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且中国的经济实力与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企业竞争力是相互促进的,中国的经济实力越高,经济规模越大,成为中国企业的强大后盾,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国际竞争力也越强;反过来,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逐渐增强,也推动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向前发展。此外,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带来的外汇储备的增加,也会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发展。东道国市场规模($\ln(\text{gdp})$)系数显著为负,即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越小,反而吸引越多的中国境外投资企业向其投资。这也符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集中于周边小国家或邻近市场的现状。双边贸易量($\ln(\text{trade})$)的系数显著为正,验证了假设 H2。这也表明现阶段由出口拉动的对外投资方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出口量的增加,有利于企业对东道国信息的积累,进而促进跨国企业将生产力转移到东道国。东道国资源禀赋(ENG)的系数显著为正,与 H3 的假设一致。这表明中国的海外投资企业有资源寻求动机。许多发展中国家拥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缺少成熟的技术或先进的设备,不能充分利用本国的自然资源,这就会吸引有资源寻求型的投资国(如中国)的投资。两国之间地理距离($\ln(\text{dis})$)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随着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减少,这也符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实际的区域分布,即中国的海外投资企业更倾向于距离较近的周边国家(东南亚等亚洲地区),与假设 H5 一致。东道国的汇率水平($\ln(\text{ex})$)的系数为负,但显著性不稳定。这与假设 H4 不一致,可能的解释为:不仅汇率的上升下降对 OFDI 有影响,汇率的稳定性对其也有影响,且汇率的稳定性对跨国企业来说影响更大,因此,考虑汇率对我国 OFDI 的影响时,不能单一的考虑汇率水平,还应考虑两国之间汇率的稳定性。 rta (中国与东道国是否签订贸易协定或是否同为某一贸易组织的成员)系数符号不稳定,且不显著,与假设 H6 不一致,可能的解释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依赖于是否签订贸易协定或是否同为某一贸易组织的成员。

表 1 全样本 GLS 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ln(\text{dgdp})$	2.910*** (0.250)	3.091*** (0.241)	2.930*** (0.247)	2.970*** (0.246)	2.880*** (0.247)	2.219*** (0.296)
$\ln(\text{gdp})$	-0.287*** (0.077)	-0.123* (0.063)	-0.319*** (0.077)	-0.312*** (0.076)	-0.362*** (0.079)	-0.490*** (0.118)
$\ln(\text{trade})$	0.779*** (0.088)	0.602*** (0.071)	0.770*** (0.088)	0.752*** (0.088)	0.782*** (0.087)	1.291*** (0.126)
eng	0.015*** (0.002)	0.019*** (0.002)	0.017*** (0.002)	0.017*** (0.002)	0.016*** (0.002)	0.018*** (0.003)
$\ln \text{ex}$	-0.076*** (0.029)	-0.063** (0.030)	-0.040 (0.031)	-0.027 (0.031)	-0.030 (0.031)	-0.110*** (0.032)
$\ln(\text{dis})$	-0.666** (0.136)	-0.729*** (0.132)	-0.642*** (0.135)	-0.696*** (0.134)	-0.566*** (0.137)	-0.352** (0.174)
rta	-0.084 (0.167)	0.188 (0.159)	-0.169 (0.169)	-0.207 (0.168)	-0.087 (0.166)	-0.710*** (0.199)
ps		0.193*** (0.074)				

	(1)	(2)	(3)	(4)	(5)	(6)
rl			0.254*** (0.086)			
cc				0.309*** (0.076)		
lnwage					-0.000*** (5.95e-06)	
cd						-0.232*** (0.060)
常数项	-73.656*** (7.263)	-79.994*** (6.982)	-73.619*** (7.214)	-74.329*** (7.175)	-72.167*** (7.202)	-57.59*** (8.98)
样本量	644	644	644	644	644	498
调整后的 R ²	0.577	0.578	0.582	0.592	0.585	0.616
W	894.93	896.76	915.95	933.93	926.26	818.87

注:***、**、* 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关于其他变量。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 $\ln(\text{wage})$ 的系数显著为正,但系数很小。可能的解释为:一方面,工资水平越高意味着劳动生产率越高。由于中国的 OFDI 具有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对东道国的优秀管理人才和优秀技术人才有需求,所以东道国的工资水平越高,反而中国对其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也越多。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工资水平并不算高,即中国国内拥有较高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这也导致了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对中国的跨国企业的影响并不明显。代表东道国制度环境的政治稳定性(ps)的系数显著为正;市场法制度度(rl)的系数显著为正;社会及公众对腐败的容忍和控制度(cc)的系数显著为正,与假设 H8 一致。这表明良好的制度环境会吸引中国的跨国投资主体对其的投资。高度的政治稳定性及较少发生暴乱事件会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不断成熟,海外投资企业规避制度风险的意识明显增强。一般来说,市场的法制环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会轻易波动,在良好的市场法制环境下,契约的履行程度和知识产权受保护的度都会提高,对跨国投资企业的吸引就越大;腐败可能会使经济运行中出现更多的寻租行为,导致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投资时需要承担很多额外成本,同时还有可能降低公司整体的经济效率,从而导致跨国公司减少对其的直接投资。文化距离(cd)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更倾向于在文化环境与中国相近的东道国投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由文化距离引起的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等投资成本。这一结果与假设 H9 一致。

由于国家发展水平各异,市场规模、技术条件和制度环境等也都各不相同。为了检验中国的对外投资主体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位分布的战略动机,本文将样本东道国按国际通用标准区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其中发达国家15个,发展中国家46个,再分别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样本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和表3。

表2 发达国家的样本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ln(\text{dgd})$	2.803*** (0.609)	2.890*** (0.624)	2.914*** (0.616)	2.961*** (0.619)	2.897*** (0.625)	2.852*** (0.609)
$\ln(\text{gdp})$	-0.146 (0.387)	-0.062 (0.425)	-0.042 (0.411)	-0.100 (0.411)	-0.106 (0.403)	-0.132 (0.378)
$\ln(\text{trade})$	0.902** (0.459)	0.817* (0.481)	0.777* (0.469)	0.813* (0.469)	0.858* (0.485)	0.860* (0.455)
eng	0.024 (0.021)	0.023 (0.022)	0.023 (0.022)	0.022 (0.022)	0.024 (0.022)	0.029 (0.021)

	(1)	(2)	(3)	(4)	(5)	(6)
lnex	-0.786** (0.314)	-0.820** (0.327)	-0.860*** (0.321)	-0.783** (0.322)	-0.792** (0.337)	-0.776** (0.354)
ln(dis)	-1.928 (1.235)	-2.088 (1.305)	-2.467* (1.307)	-2.339* (1.283)	-1.937 (1.340)	-1.067 (1.295)
rta	0.937 (0.872)	0.993 (0.919)	0.979 (0.888)	0.905 (0.909)	0.873 (1.040)	0.904 (0.849)
ps		0.141 (0.648)				
rl			1.013 (0.779)			
cc				0.815* (0.483)		
lnwage					-0.000* (0.000)	
cd						-0.357 (0.302)
常数项	-65.492*** (17.481)	-67.813*** (18.093)	-69.114*** (17.779)	-73.518*** (18.215)	-68.004*** (18.112)	-72.547*** (18.867)
样本量	158	158	158	158	158	158
调整后的 R ²	0.710	0.704	0.729	0.722	0.704	0.727
W	266.25	262.31	268.12	270.09	262.22	273.21

注: **、*、* 表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

表 3 发展中国家样本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ln(dgdp)	3.542*** (0.277)	3.536*** (0.277)	3.547*** (0.277)	3.541*** (0.277)	3.528*** (0.279)	3.069*** (0.372)
ln(gdp)	-0.056*** (0.086)	-0.064*** (0.088)	-0.054*** (0.086)	-0.057*** (0.086)	-0.061*** (0.088)	-0.171*** (0.147)
ln(trade)	0.381*** (0.095)	0.384*** (0.095)	0.376*** (0.095)	0.381*** (0.095)	0.386*** (0.095)	0.721*** (0.160)
eng	0.018*** (0.002)	0.018*** (0.002)	0.018*** (0.002)	0.018*** (0.002)	0.018*** (0.002)	0.021*** (0.003)
lnex	0.019 (0.030)	0.016 (0.031)	0.008 (0.031)	0.019 (0.031)	0.024 (0.032)	0.047 (0.035)
ln(dis)	-0.833*** (0.143)	-0.832*** (0.143)	-0.825*** (0.143)	-0.830*** (0.147)	-0.822*** (0.145)	-0.349*** (0.199)
rta	-0.069 (0.185)	0.065 (0.186)	0.012 (0.196)	-0.064 (0.199)	-0.094 (0.195)	-0.721 (0.225)
ps		-0.033 (0.086)				
rl			-0.154 (0.121)			
cc				-0.009 (0.127)		
lnwage					-4.59e-06 (0.000)	

	(1)	(2)	(3)	(4)	(5)	(6)
cd						-0.426*** (0.084)
常数项	-91.631*** (8.079)	-91.345*** (8.120)	-91.859*** (8.076)	-91.639*** (8.088)	-91.306*** (8.126)	-83.065*** (11.379)
样本量	486	486	486	486	486	340
调整后的 R ²	0.567	0.567	0.569	0.567	0.567	0.609
W	625.97	625.00	628.39	624.68	625.04	514.70

注:***、**、* 表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

本文利用 2003—2014 年中国对 61 个国家 OFDI 的跨国面板数据,基于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了中国 OFDI 的区位分布。根据检验结果,各变量与中国 OFDI 的显著性关系如下表 4 所示。

表 4 实证检验结果

	全样本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ln(dgdp)	+	+	+
ln(gdp)	—	不显著(—)	—
ln(trade)	+	+	+
eng	+	不显著(+)	+
ln(ex)	不显著(—)	—	不显著(—)
ln(dis)	—	不显著(—)	—
rta	不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ln(wage)	—	—	不显著(—)
ps	+	不显著(+)	不显著(—)
rl	+	不显著(+)	不显著(—)
cc	+	不显著(+)	不显著(—)
cd	—	不显著(—)	—

从表 4 中我们发现,就总体而言:(1) 中国 OFDI 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这符合一般意义上的跨国投资原理;(2) 与东道国 GDP 显著负相关,这与 Summary(1995) 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论一致,也与 Maskus(1999)、Hanson、Mataloni 和 Slaughter(2001) 的结论一致。跟发达国家的 OFDI 相比,中国跨国企业的整体竞争力还不够强,在发达国家投资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的 OFDI 往往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所以就现阶段而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区位分布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3) 与双边的贸易联系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与 Helpman 和 Krugman(1986)、Pfaffer mayr(1994)、Leichenko 和 Erichson(1999) 的结果一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还处于初级阶段,出口拉动的对外投资在我国目前的国际投资方式中占比很重。这也可以从侧面看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发展水平还不高。随着跨国企业的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都随之增加,为降低这种成本,跨国公司会考虑将生产力转移到东道国,实现了从对外贸易到对外直接投资的转化;(4) 与东道国的资源禀赋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与李猛、于津平(2011)、宋维佳、许伟宏(2012) 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一结果也验证了中国的跨国企业属于资源寻求型企业。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对中国的跨国企业有很大的吸引力。此外,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资源的需求越来越

大,大量依靠进口,而想要获得稳定的资源进口源,中国有必要在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5)与东道国之间的地理距离显著负相关,这与项本武(2009)、李猛、于津平(2011)的研究结果一致。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越远,运输成本、管理效率、管理成本都回受到影响,从而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成本。一般而言,距离越远,中国对其的投资越少;(6)与劳动力成本显著负相关,但相关系数很小,这说明中国 OFDI 属效率寻求型这一特征;(7)与东道国的制度环境显著正相关,这与阎大颖(2013)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一结果表明中国的跨国投资企业偏向于在制度环境较好的东道国进行海外投资,即中国 OFDI 并不偏向制度接近的国家,这说明中国企业更倾向于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对东道国制度缺陷的利用并不是中国企业的战略目标;(8)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显著负相关,这与许和连、李丽华(2011)的研究结果一致。所谓“入乡随俗”,企业去东道国投资,必须适应当地文化习俗、消费偏向等,两国之间的文化距离越大,适应越困难。因此,我国的跨国投资企业更倾向于在与我国文化环境相似的国家 and 地区投资。

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进一步检验发现,进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企业的战略目标明显不同。就流向发达国家的投资而言,中国 OFDI 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双边贸易联系、汇率、劳动力成本显著相关;而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而言,中国 OFDI 更多的是被发展中国家丰富的资源禀赋吸引。总体而言,中国的海外投资企业对发达国家是技术战略寻求,对发展中国家是资源寻求、成本寻求。

六、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可以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对跨国投资公司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正确的区位选择将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获得更有利的经济环境和经济要素。不仅为企业找到了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契机,而且为企业找到一条国际化的不同于国内的经济之路。但是,对跨国企业来说,作出正确的区位选择决策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首先,企业要对自身有客观地认识,充分了解自己的企业竞争力和比较优势。比较优势不同,战略目标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跨国公司考虑的因素不一样,区位选择也不一样。其次,跨国企业必须对目标东道国有充分地认识和了解,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经济、不同的政治、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地理环境,海外投资企业应该按照“扬长避短”的原则,能够在东道国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和合理利用东道国的经济环境。

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前人学者们的研究分析以及本文前面章节的分析来看,现阶段,我国是一个对外直接投资(OFDI)还处于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开展对外投资的跨国公司还处于技术不够先进、跨国投资经验不足、海外投资规模较小、国际竞争力不够强的现状。此外,我国的跨国企业还依赖政府的政策支持。为帮助跨国企业作出明智、有远见的区位选择策略,需要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一) 宏观角度上,区位选择的总体战略

我国的跨国企业要想在国际化经营上走一条可持续的、快速发展的路,离不开我国政府政策上的支持、决策上的指导。政府应规范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体系,使企业能在完善的体系下健康的发展。此外,政府还应把对外直接投资(OFDI)纳入国民经济的战略规划,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总方针、总体战略目标以及指导方针,给跨国企业指导建议,落实中国“走出去”的战略部署。同时,对于有潜力的企业予以实际性的鼓励支持,推动更多的企业走上国际化经营之路。此外,还要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地区投向和产业选择进行把控,防止同一产业或同一地区的投资密集度过高,造成我国跨国投资企业之间出现恶性竞争。

(二) 微观角度上,区位选择的具体策略

我国的跨国投资企业在现阶段作区位选择决策时,首先应确定好经营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市场寻求、资源寻求还是战略寻求,这将从大方向上确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走向发达国家,还是走向发展中国家。其次,企业是选择已有较大市场空间的国家还是选择有较大市场潜力的国家。最后,企业应尽量选择投资成本较低的国家进行投资。

1. 继续将东南亚、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作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主要区位。我国跨国企业对

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在现阶段应以东南亚、拉美以及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为主。我国在文化环境、地理条件等方面与东南亚国家有更大的相似性,这不仅有利于我国的跨国企业开发其市场,还可以为跨国公司节省投资成本。将区位选择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稍低于我国的发展中国家,理由是因为在发展中国家,我国企业拥有较强的相对竞争力,有利于我国更好地实现规模经济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规模。在某些资源丰富、发展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跨国企业甚至拥有垄断优势,在该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不仅能充分利用我国短缺的自然资源,还能拉动产品出口,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巩固国际市场份额。

从东道国的角度来看,现阶段,东南亚各国基本上都处于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也意味着东南亚各国存在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同时,除了新加坡,其他国家的经济实力都低于中国,这有利于我国的跨国企业发挥相对垄断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都吸引着我国有资源寻求需求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样,拉美和非洲都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如,巴西的铁矿砂产量排名世界第二,锰矿、铀矿产量排名世界第三。非洲的金、锰、磷等多种矿产资源储量居世界之首。资源寻求型的企业在这些地区可以大有作为。

2. 稳步推进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适当的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有利于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向纵深发展。首先,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有利于规避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问题。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加大了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而对外直接投资有效地避开了贸易壁垒,代替对外贸易在东道国继续开拓海外市场。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企业对先进技术和优秀管理经验的学习和积累,进而不断地提高我国企业的综合实力。因此,在我国海外投资企业既没有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也没有资本比较优势,更没有经验比较优势的情况下,技术寻求型企业应稳步推进在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并逐步扩大在发达国家的投资,这也是我国经济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 [1] Fragiskos Filippaios, Marina Papanastassiou & Robert Pearce. The evolution of U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pacific rim: a cross - time and country analysis [J]. Applied Economics 2003, 35(6) .
- [2] Stephen Ross Yeaple. The role of skill endowments in the structure of U. 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3, 85(3) : 726 - 734.
- [3] Nigel Driffield, James H. Love & Karl Taylor. Productivity and labor demand effects of inward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UK industry [J]. The Manchester School 2009, 77(2) : 171 - 203.
- [4] Rosfadzimi Mat Soad & Abd Halim Mohd Noor. Home countries' determinants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Malaysian Case [J]. Prosiding Rerkem 2011(2) : 299 - 307.
- [5] Rajib Sanyal & Subarna Sarnanta. Effect of perception of corruption on outward U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Glob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Review 2008, 10(1) .
- [6] Dirk Holtbrugge & Heidi Kreppel. Determinants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BRIC countries: an explorative stud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s 2009, 7(1) : 14 - 30.
- [7] 陈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足与展望 [J]. 探索与争鸣 2005(12) .
- [8] 陈凡, 王方.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状况与问题解析 [J]. 国际经济合作 2004(2) .
- [9] 郭建中. 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2002(4) .
- [10] 李汝, 丁宪浩. 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定位与策略选择 [J]. 当代经济科学 1999(1) .
- [11] 刘海云. 规模经济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 [J]. 国际贸易问题 1998(8) .
- [12] 方明媚.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2008(6) .
- [13] 程惠芳, 阮翔. 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J]. 世界经济 2004(11) .

- [14] 项本武. 东道国特征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9(7) .
- [15] 李猛, 于津平. 东道国区位优势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研究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1(6) .
- [16] 许和连, 李丽华. 文化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分析 [J]. 统计与决策 2011(17) .
- [17] Dunning J. H.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M]. New York: Addison – Wesley Publishing Ltd. ,1993: 3579.
- [18] Dunning J. H. ,The Eclec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 Restatement and Some Possible Solutions [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88: 40 – 78.
- [19] Frederick T. Knickerbocke ,Oligopolistic reaction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J]. The International Executive ,1973 ,15(2) : 7 – 9.
- [20] Aliber. A theor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M]. Cambridge: MIT press Cambridge ,1970.
- [21] Buckley P. and Casson M. The Futur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 London: Macmillan ,1976: 25 – 43.
- [22] B Kogut ,SJ Chang.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1(3) : 401 – 403.

The Research of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cation Choice

XIAO Yaofei , ZHU Bi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China)

Abstract: In today'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ns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this context ,by using the gravity model system , this article analyzed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cation choice from economic factors ,political system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geographical factors and so 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FDI strategic objectives of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investors are obviously different ,its investment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belonging to the type of technology strategy seeking and market seeking ,and its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elong to the type of resource – seeking.

Key wo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cation choice; the gravity model

(责任编辑: 张秋虹)